專題對話

尊重中國傳統 融入中國社會

——關於基督教中國化問題的對話

■ 劉金光

《中國宗教》雜志社長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　要：在最近舉行的紀念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年的會議期間，本刊總編輯梁燕城博士與國家宗教局《中國宗教》社長劉金光圍繞基督教中國化進行了深入的對話和探討。在對話中，作為國家宗教管理局的官員，劉金光全面闡釋了中國政府既定的政策和規定，尤其對一些涉及宗教信仰和活動具體的問題進行了澄清和說明。作為基督教文化學者的梁燕城認為這樣的對話很有益，期望中國基督教能按聖經原則講，又能配合文化與社會的特質，生根在中國，健康而合法地發展，不會成為一個敏感課題反而是一正能量。

關鍵詞：基督教中國化，宗教管理，政教關係。

所謂「基督教中國化」的提法原本不是最近才由政府提出來的，實在是從歷史上當基督教進入中國並進行傳播時，就已經出現這個課題和現象。一些傳教士都是知道要用中國的方法和文化，讓中國人能理解和接受基督教的教義。

探討在中國文化與社會中的宗教方向

□：歡迎劉金光社長能夠來參加我們舉辦的「馬丁路德改教思想與中國文化學術研討會」。你是宗教局的學術專家，對中國的宗教政策和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情況十分瞭解，很高興能與你對話。我們可以討論一下中國當前的宗教發展，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情況。一方面，中國出台了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在海外有不同回響，提出不同問題，也有人產生疑慮。另一方面，最近幾年在宗教文化界有關「基督教中國化」的提法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海外也有一些爭論，這次可以請你來解釋真實的情況，瞭解新修訂「宗教事務條例」，及提出「基督教中國化」的原意。

基督教中國化原是基督教宣教士的努力

近些年關於基督教中國化問題的討論最早是由學者引起的，北京大學與中國社科院也邀請我參加了這種討論，探討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基督教如何在保持聖經信仰及基要教義的核心下，與中國文化會通共融。學者們的努力是希望基督教信仰能生根中國，而不再被視為外國滲透。從我個人的理解，所謂「基督教中國化」的提法原本不是最近才由政府提出來的，實在是從歷史上當基督教進入中國並進行傳播時，就已經出現這個課題和現象。傳教士中一些有識之士從一開始就很懂得用中國的方法和文化習慣進行傳播，從利瑪竇到馬禮遜，他們都熟讀中國文化的經典與精粹，到李提摩太更知道基督教只要來到中國，就必須與中國的社會需要和文化現

狀相配合，所以在這整個過程中，一些傳教士一開始就用了中國化的方法。當然不一定用「中國化」這個名詞，有時會用「本色化」或「本土化」等名詞，都是知道要用中國的方法和文化，讓中國人能理解和接受基督教的教義。

我自己基本是從三個層次來理解「基督教中國化」的，第一是基督教要進入中國就必須對中國文化有理解並進行對話。近代早期外國傳教士大部分都對中國古代文化有一定理解，有不少這方面的主張。然後，從中國古代文化到普通的民間文化，包括一些民俗、禮儀、節期等，如何去理解和融入。第二層次，基督教進入中國，也需要對中國社會特式有一個理解，讓基督教所講的能符合這個社會的發展，是有幫助的。故基督教在教育、醫療、撫貧等作出貢獻。第三層次，是參與從社會發展到整體中國的發展，包括跟官方的溝通，像李提摩太就跟中國最高層官員如李鴻章、翁同龢、康有為等有交往與建議，而且也主張基督教應作為一種新時代特有的文化來支持中國走向現代化。

利馬竇、馬禮遜、李提摩太與戴德生

在中國逐步現代化過程中，宣教士的努力，是傳揚基督信仰時，既要維持其自身真理核心，但也不違背中國本身的文化和社會性質。我曾重點研究的幾個重要宣教士，像利瑪竇對中國經典、哲學、文學都有很深的認識和研究，馬禮遜研究中文，編了華英字典，也是很不簡單的，又辦了英華書院和出版報紙，如《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等。而李提摩太在同中國政府接觸時還介紹及建議一些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方向，戴德生及其宣教士們，更是梳了中國的辮子，染黑頭髮穿了中國的服裝進入內地，跟普通的中國人民在一起生活。他知道當時中國最大的苦難是鴉片，所以建了許多戒煙診所，到一九〇五年建立一百多家戒煙診所，努力消除外國鴉片侵略給中國人帶來的後果。有一些傳教士後來回到英國，如德貞牧師（H.J. Beattie）一八七六年回英成立反鴉片會，一八九〇年在英國成立了十個反鴉片分會，他們收集了十九萬二千多個簽名，通過政治遊說，說服國會通過法律禁止向中國銷售鴉片。一九〇六年戴得道（Theodore Taylor）議員動議：「鴉片貿易違反道德」，得一致通過，終於一九一一年五月英國與中國簽協議停止進口鴉片，一九一三年命令印度全面停售鴉片給中國。反鴉片運動是宣教士們關心中國社會與人民困苦的奮鬥，也可說是一種基督教中國化的努力。

這些都說明傳教士很重視對中國文化、中國社會、中國國情的瞭解，所以才能在中國建立比較好的教會。傳教士的種種努力，可以看作是當時最早的「基督教中國化」。當然，我們現在再講「基督教中國化」，就要面對中國目前所處的新的發展，經過改革開放後中國有可能成為一個新的強國，今日重點是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基督教是否有助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呢？我想，如果通過歷史的經驗，對照一下歷史的「基督教中國化」和現在的「基督教中國化」，從中找出共同的規律，關鍵是既使基督信仰生根中國，又有可能使基督教同中國社會成為一種互相配合和互相理解的關係。

中國教會史上許多傳教士的努力

■：梁博士客氣了，多謝您的機構邀請我來參加會議。我不是什麼專家，只是工作時間比較長、瞭解和認識多一些而已。剛才您講的看法，我從整體上是認同的，也就是說，中國化，或者本土化或本色化的問題，教會是一直在探索的。剛才你所回顧的歷史，因為我是學歷史出身的，所以對這段歷史也是熟悉的。基督教傳入中國，如果從

如果通過歷史的經驗，對照一下歷史的「基督教中國化」和現在的「基督教中國化」，從中找出共同的規律，關鍵是既使基督信仰生根中國，又有可能使基督教同中國社會成為一種互相配合和互相理解的關係。

唐朝開始，應該是有四次，唐朝景教進來的時候，就是用了佛教的符號，教堂也叫廟或寺，說明當時他們也想同中國文化進行融合的努力。這段歷史維持了三百年左右就中斷了，但現在還存有遺跡和有關文物。到了元代，則有也里可溫教，當然也里可溫教有一個問題，就是限於統治階級或貴族內部信仰，沒有落地生根或向下發展，所以隨著元代消亡也里可溫教也就沒有了。從元末到明代一直到清初，利瑪竇尊重中國文化是大家公認的，他曾說過儒生統治這個國家，我們一定要尊重，他也有儒教是中國最大的宗教這種說法。他也根據中國傳統文化寫出了《天主實義》這本書，影響還是很大的。在這本書裏他講，「吾言之天主，即華言之帝」，他說的天主與中國人講的上帝是一回事，不過「特異以名也」，只是名字不一樣。他也身體力行，包括在廣州肇慶剃光頭穿和尚衣服傳教，因為他聽說中國老百姓喜歡佛教，為了把天主教傳播出去，用這個方法可以接近中國百姓。後來他聽說中國的上層都是科舉考出來的儒生，所以脫掉僧衣換上儒服，結交了像徐光啟這樣的官員朋友。

關於他的一些努力，我曾經跟天主教一些朋友提到，如果天主教一直按照利瑪竇的這種方法（就像康熙皇帝說的「利瑪竇規矩」）傳教的話，恐怕中國化早就實現了，因為你一來就給人一個印象，尊重中國的文化傳統，融入中國社會，從政界到百姓都沒有反感。後來的「禮儀之爭」就是眾所周知了，引起了高層康熙皇帝同教皇之間的矛盾，這個確實涉及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個核心，一個是信仰天主教就不能拜祖宗，二個是不能拜孔子，這個對中國來說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康熙皇帝就說，中國幾千年來就是敬天法祖，為什麼信了天主教的中國人就不能拜祖宗，不能拜孔子？這會動搖中國文化的根基，這是中國人無法接受的，康熙皇帝就下令把外國傳教士驅逐出了中國，導致了「百年禁教」。第四次傳入中國是鴉片戰爭之後，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完成了，基督教新教也產生了，再次進入中國時，傳教士和中國的主權利益方面，以及老百姓的感情方面，都產生了一些矛盾和衝突，尤其是伴隨著鴉片戰爭的槍炮進來，觀感就不一樣了，再加上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取得的傳教特權，有的傳教士依仗特權幹壞事，所以發生了許多殺傳教士的「教案」。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正如你所提到的李提摩太等人，還有內地會的戴德生，也意識到了傳教必須尊重中國文化，同中國文化結合。還有天主教的樞機主教剛恆毅（原籍是意大利的），他作為第一位羅馬教廷派到中國的宗座代表，也明確提出天主教的事務要由中國人自己來辦，而且他是第一次帶領六個中國人去羅馬祝聖為主教，他可以說也是較早實行中國化或本地化並作出貢獻的。這裏不乏有識之士，包括中國的教牧人員和西方教牧人員中，他們都認同應由中國人自己來辦理教會，包括李提摩太關於「孔子加耶穌」的提法，這個你應該比我熟悉了。

如果天主教一直按照利瑪竇的方法（就像康熙皇帝說的「利瑪竇規矩」）傳教的話，恐怕中國化早就實現了，因為你一來就給人一個印象，尊重中國的文化傳統，融入中國社會，從政界到百姓都沒有反感。

從建國到改革的曲折發展

現在我們所談到的中國化，在新中國建立之後有一個曲折的過程，天主教也有比較複雜的過程。梵蒂岡有一個代表叫黎培理，他是羅馬教廷駐華公使，是一位總主教，一直在中國住到五十年代，當時他在南京要求中國的天主教徒，第一不能看共產黨的報紙，第二不能參加共產黨的會議，第三不能聽共產黨的廣播，還有中國人不能自己選主教，這對一個新成立的政權，就形成一種從西方來的負面的感覺。對於新教來說，五十年代一系列政治運動或政治事件的環境，包括抗美援朝，有的基督徒對新中國是積極的，像吳耀宗等都起了帶頭作用，但有的則比較消極，所以這個背景是很複雜的。因此我們說在五十年代有兩個改革，一個是基督教和天主教過去跟帝國主義的聯係，包括經費的資助，以及教育，都切斷了。這是新政權對鴉片戰爭以來基督教在中國的一個判斷，而且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

中國不是一個宗教國家，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甚至在先秦時期，也沒有聽說過政權受到宗教影響，這個中國的傳統是比較獨特的，而且中國的政教關係，一直都是「政主教從」，對歷史熟悉的人都比較容易理解這一點。

有一句話，就是「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就是這樣一個背景。但是我們當時在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對信眾還是保障他們信仰自由的，這是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三一年在瑞金制訂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開始延續下來的。新中國建立之初的五十年代，我們在天主教方面也是尊重天主教傳統的，當時我們選出了兩位主教，按照聖統制的規矩報請梵蒂岡批准，但是梵不但不批，還給予這兩位主教「超級絕罰」，中國只得走「自選自聖主教」的道路。後來到了「文革」，不但宗教，而且整個國家的生活都受到了破壞，有些宗教人士受到迫害和打擊。這個過程當然會造成國家政治和宗教之間不太順暢的情況。

改革開放之後，我們撥亂反正，恢復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這個決心是很大的。一九八二年有一個重要文件，中央十九號文件，是一個對宗教撥亂反正的文件，系統地闡述了作為無神論的共產黨如何認識宗教的本質，看待宗教發展的規律，應該採取如何的態度和政策對待宗教。當然，這個過程中始終會伴隨一些矛盾和問題，例如，改革開放之後，天主教方面，出現梵蒂岡秘密派人進入中國委任主教而主教秘密委任地下神甫的問題，地下神甫再去影響一些信徒，與中國政府相抗衡，這就影響到了政治關係和外交關係的問題。至於基督教，包括很多教會尤其是農村地區，還在宣揚「聽神的不聽人的」，以此為藉口不遵守政府的政策法律。我聽到一些學者曾提到路德和加爾文論述的政教關係，可能比較適用基督教的國家，但對中國這樣一個從來也沒有以某個宗教為主的國家，就不一定適宜。

中國的政教關係

中國不是一個宗教國家，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甚至在先秦時期，也沒有聽說過政權受到宗教影響，這個中國的傳統是比較獨特的，而且中國的政教關係，一直都是「政主教從」，對歷史熟悉的人都比較容易理解這一點。那麼，「聽神的不聽人的」神學思想的宣傳導致信眾與政府的矛盾與對立，再加上一些突破或違反政策界限的活動，以及改革開放後境外確實存在一些敵對勢力，他們希望恢復原來舊的差會關係，甚至妄想利用宗教在中國搞顏色革命，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這就促使我們在加強宗教事務管理的同時，要消除殖民地色彩的神學思想，就要推進宗教的中國化。

如果說，對於二〇一五年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宗教中國化，當時也許有人會誤以為是僅僅針對西方來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因為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佛教二千年已經中國化了，伊斯蘭教明末清初也基本實現了中國化，但到了二〇一六年的宗教工作會議，習總書記提到宗教中國化時，講的就更加明確，就是特別強調要與當代中國發展相適應，這就大大拓展了中國化的內涵，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理解的中國化，不僅僅是指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中國化，而且指中國每一個合法的宗教都有一個中國化的問題。比如，對道教來說，它有一個當代化的問題。因為我們現在講的中國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化，而是與當代中國相適應的中國化，而佛教和伊斯蘭教也都有一個當代化的問題，中國五大宗教都有一個中國化的任務，不過側重點不一樣。按照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宗教中國化有兩個途徑，一個是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前不久我去廣州馮浩牧師的天河教堂，他們正好有一個展覽，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如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等，一句一句用聖經的相應詞句和經文找出來加以對照，我認為很有意思。馮浩牧師說，只要我們好好挖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不是同聖經格格不入的，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基督教是行得通的。我參加過內地很多研討會，包括基督教的，他們都在做中國化這個工作，如果真正踏踏實實地去挖掘一些聖經源頭上的思想，是可以找到的，宗教的教義思想並不是

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定矛盾的，而是相行不悖的，是可以相近和融合的，而且在堅持宗教中國化過程中可以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

還有一個，就是用中國傳統文化來浸潤各個宗教，而且要求各個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不變的同時，挖掘各種宗教中包括友善、慈愛、和平、向上、向善等有利於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就像習總書記所講的兩個條件，只有實現中國化的宗教，只有走中國化道路的宗教，才能跟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才能夠在中國這個社會裏面發揮積極的作用。目標是相適應，而中國化則是一條重要的途徑。只有達到中國化了，才能真正的相適應。就像習近平總書記在二〇一六年七月到寧夏回族自治區一座清真寺考察時講的，「我國的各民族和宗教是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孕育發展起來的，只有落地生根才能生生不息」。

分析近代西方與傳教士之別

□：你剛才講「要求各個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不變」，這點令信徒們安心，有些信徒擔心「中國化」是政治上要改變信仰核心，人因信稱義而得救，但若果保持基要信仰不變，在基督教是指三位一體的上帝，耶穌道成肉身，釘十字架死而復活，帶來救贖，聖經是聖靈默示等，如果保持基本信仰，其他一切適應與調和本土文化和社會的做法是自然必須的發展。我們從歷史上先來理解，初期基督教傳入中國的過程就是一個相互理解的過程，但是當鴉片戰爭以後，就面臨了一個難題，就是西方侵略進來，在這個情況下，要中國人理解基督教就會產生一定的隔閡，要中國人理解基督教就比較難了，因為從前利瑪竇那樣的傳教士很尊重中國文化，跟知識份子談得很深入，但鴉片戰爭以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再加上傳教士本身有西方來的優越感（當然有些是很謙卑的），傳教士進來後，有些人是聽而相信了，但精英階層還是有排斥情緒的。但須清楚說明，西方侵入中國是違背基督信仰的，耶穌基督的教訓是無條件的愛，原則上是反侵略的。

後殖民研究大師薩依德(Edward Said)用「東方主義」(Orientalism)概念，指出西方人研究東方不是真正的東方，而是西方人認為的東方。在這種殖民主義的年代，西方主義基本上是認為西方比東方好，比東方先進。Ian Buruma指出在東方人看西方則是一種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如Couze Venn所言，西方主義是「以歐洲人做為人性歷史代表範本的主體」。基本上西方在侵略全世界時，提出一種合理化自身利益的主張。當年英國統治香港時，有一些西方人認為東方人只是優秀的勞工，而西方人可以勝任優秀的管理者和統治的主人。Joseph-Ernest Renan在其一八七一年發表La Reforme intellectuel et morale說：「自然界製造了一個做勞工的族裔，就是中國人，……還有一族裔是做主人和軍人的，那是歐洲人」。他主張西方帝國的天職是去開化落後的非歐洲人。這種觀點是違背基督教的，耶穌基督視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愛護和尊重所有人，有一批宣教士很不認同這些殖民主義，而主張本色化或本土化，也為幫助中國社會克服困難作出過貢獻，這就是早期的基督教中國化的努力，此時亦有不少中國信徒領袖建立生根本土的教會。

當新中國成立時，世界處於冷戰對立時期，西方當然想利用原本在中國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支持他們的戰略，而中國也同樣很怕西方利用基督教和天主教進行滲透，這基本上形成了一種對教會看法的主流解釋。所以，新中國頭三十年對基督教和天主教基本是作了很多限制，也通過三自運動切斷與西方的關係。但三自運動內

宗教的教義思想並不是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定矛盾的，而是相行不悖的，是可以相近和融合的，而且在堅持宗教中國化過程中可以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

部也產生一個基本矛盾，就是因為基督教內部也有信仰的正統派跟自由派的區分，而三自領頭人吳躍宗是自由派的，所以屬於傳統信仰那一派就會反對，從這個角度他們拒絕加入三自，也就形成很多教會內部的爭論與矛盾。再加上中國同西方列強的矛盾，重重矛盾之下，就出現了敵我矛盾跟人民內部矛盾的交錯，教會當然很難健康地發展。經過「文革」教會全面停擺之後，有一個很奇異的現象是，基督徒人數反而增加了。這個很難使人理解。我個人認為應該是經過磨難之後的教會，會產生一種純真而屬靈性的信仰，這時不再有外國勢力影響，也沒有了教堂和禮儀，中國信徒純在本土處境相信，並且心靈經歷基督帶來的內在轉化，變成一種有生命的宗教，因為「文革」的困難中，人很珍惜一種上帝與人及人與人的親愛之情，這些都是基督教中最真純的體會，也可以說，清除了兩千多年來基督教中的很多外在的東西，中國也就產生了最純良與有靈性的基督信仰。

允許基督教有一個正常生存而不是去摧毀

「文革」之後，教會重新開放，但家庭教會仍然存在，而且原先的正統派跟自由派的矛盾仍然存在，而中國政府仍然對西方勢力滲透家庭教會保持警惕，這裏也是有許多需要解決和處理的問題。當中國社會發展到一個成功的年代，尤其是最近十多年來沒有動蕩和危機，中國在宗教政策上的開放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二〇〇七年中央政治局還專門請宗教專家進行集體學習。同時，理論界對宗教是否「鴉片論」有了討論的空間，對基督教有一個較全面的理解，允許基督教有一個正常生存而不是去摧毀它，認同宗教在中國社會將會長期存在。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國家想正確認識宗教並給它一個正規的位置。同時，我也作過一些調查和研究，認為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之間的矛盾不一定是全部都是政治上的，而是神學觀上的不同，我有些意見也向有關方面做了反映。現在，由於一些人的過世，原先存在的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之間存在的神學難題也慢慢不存在了。三自裏面出了很多靈性很好的基督徒，家庭教會也有靈性很好的基督徒，但也有異端的。總體上情況都得到改善，跟從前不一樣了，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之間不再像以前那麼對立了。這期間發生的一些問題，例如浙江拆十字架的事件，經過我瞭解並同有關部門溝通後，知道這並不是中國要改變政策甚至要大舉迫害基督徒，澄清了外界的一些疑慮，這件事後來也得到了很好的處理。

重新定位的努力的嘗試

從學者討論中國化到最後被國家政策認同，作為宗教政策的一個方向，現在大家都慢慢進入到一個可以互相理解可以並存的年代。我們可以說，當今時代是中外之交，也是古今之變的年代，基督教最初就是在中外之交中產生的矛盾和誤解等，現在雙方都慢慢對對方有了瞭解。從中國來說，它已日益強大，是全球都要合作的對象，很多人願意看到中國教會的正常發展，而且外國人進入中國教會，都會看到中國基督徒不僅信仰純正，靈性有深度，而且很單純，因為信仰的人沒有什麼利益，有真實經歷的人才會有堅持。而在古今之變中，中國也在現代化了，而且成功了，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那麼基督教如何適應一個強大的中國，而不再是一個在掙扎中很痛苦的中國？又是一個新的問題。中華民族的夢習近平總書記已經闡述的很清楚。

我常常在思考，如果信仰進到一個國家、民族和文化裏面，就要對這個國家、民族的希望和夢想有個理解，而基督徒可以支持這個國家、民族的需要，而不是指責，

「文革」的困難中，人很珍惜一種上帝與人及人與人的親愛之情，這些都是基督教中最真純的體會，也可以說，清除了兩千多年來基督教中的很多外在的東西，中國也就產生了最純良與有靈性的基督信仰。

批評，甚至要引進西方來欺負它，這是後殖民地的基督教。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基督教的中國化，從中外之交到古今之變，教會內部矛盾也慢慢化解，教會與政府矛盾也慢慢化解，就可以開始一種重新定位的努力的嘗試。

把信教群眾作為執政的基礎

■：你的理解從整體上是很到位的，尤其是對改革開放之後教會的發展，對宗教生活的感悟，都是很純正的，而且你的觀察也很仔細很準確。現在確實是在變，整個國家與社會都在變化，也許有些問題外界容易誤會。一個是因為共產黨執政，因為共產黨是無神論，就先入為主地以為無神論的共產黨不會真正讓人有宗教信仰自由，以這個預設來觀察一些事情，所作出的判斷我認為往往是誤判。他們沒有理解中國共產黨現在作為一個執政黨的宏偉目標是什麼，而宗教政策是要符合黨和國家的大目標的，那麼在這個前提下，執政的無神論的共產黨也必須把信教的群眾作為執政基礎的一部分，這一點外界恐怕理解不了，為什麼無神論共產黨把信教群眾作為執政的基礎？這就是我們國家的國情所決定的。畢竟中國現在的信教群眾從相對數量來講還是一小部分，但從絕對數量來講卻是一個相當大的群體，這些信仰宗教的群眾是我們的基本群眾，所以我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個出發點或落腳點就是把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團結在一塊，團結起來幹什麼呢，就是執政黨目前的兩步走，先是實現小康社會，再是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這個目標需要團結黨內黨外信教不信教的群眾共同來完成。這就是我們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出發點，而且在沒有執政之前就已經有過實踐。

去年紀念紅軍長征八十周年，我就研究過這段歷史，結論是如果紅軍長征中沒有制定正確的宗教政策，紅軍長征是不可能勝利的，因為從瑞金一出發，年輕的紅軍第一次面對那麼大規模的宗教和民族問題，長征經過的三分之一路線是經過少數民族地區，藏區，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等少數民族地區，幾乎每天都會遇到這個問題。紅軍規定無論走到哪裏都不准駐進寺觀教堂等宗教場所，這是嚴格的紀律。所以我認為，從那個時候開始，沒有執政的共產黨就已經開始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且是有理論根據的，早在一九二七年毛澤東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強調，一定要尊重農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要越俎代庖甚至要消滅宗教，後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也明確規定要尊重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並提到了外來的天主教基督教，只要他們不反對我們，我們就要尊重他們。這裏有一個小插曲，前時期有一部電視片曾介紹過，當時紅軍進入藏傳佛教地區，賀子珍的兄弟，也就是毛澤東的小舅子，當時負責為紅軍籌糧款，不小心誤入藏傳佛教的一個廟，在國民黨散布的謠言中，一些藏傳佛教人士也受了影響，把他抓起來送到紅軍部隊，看紅軍如何處理。毛澤東就一個字：殺！這是毛澤東的小舅子啊。當時賀子珍和紅軍高級將領都出來求情，那也不行，因為保護和尊重宗教的政策就在那裏，紅軍嚴格規定不准進入宗教場所。雖然沒有執政，但共產黨已經開始實踐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這個政策為後來紅軍的勝利帶來了極大的保障。

建國之後包括五四年的憲法，八二年的憲法，都明確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文革」是個特殊時期，宗教政策受到破壞，所以「文革」之後就有一個「重新恢復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問題。從縱向的歷史源頭來看，中國共產黨對宗教政策一直是審慎的，對宗教是尊重的，再加上紅軍長征中的實踐，更是證明了這一點。中央電視台曾播過一個片斷，說有一個傳教士叫薄復禮（又稱勃沙特，R.A.Bosshahdt），幫了紅軍很大的忙，四渡赤水時毛澤東沒有帶地圖，而他手裏有一份法文的地圖，就翻譯成中文送給毛澤東。

建國之後包括五四年的憲法，八二年的憲法，都明確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文革」是個特殊時期，宗教政策受到破壞，所以「文革」之後就有一個「重新恢復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問題。

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必須依法進行，而不是隨意亂來。相對地，宗教方面，則不要去干涉行政、司法、教育等這些屬於國家的職能。這些關係處理好了，大家各安其事，相信社會變得更合諧。

這個人是第一個向西方世界介紹紅軍長征的人，他是瑞士人，後來定居在蘇格蘭，寫了一本書叫《神靈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這本書於一九三六年出版，比斯諾的《西行漫記》早了一年。他當時是在蕭克將軍的部隊裏，跟紅軍走了十八個月，紅軍對他非常好，沒有吃的給他找吃的，沒有睡的也會找個門板讓他躺一下，臨走時給他十五塊大洋，他對紅軍的描述是，一群穿著破衣爛衫的人，一個個爬雪山過草地，面黃肌瘦，但兩眼炯炯有神，有堅定的信仰，就像我們基督徒有堅定的信仰一樣。確實，那時紅軍如果沒有堅定的信仰是肯定過不去的。斯諾的《西行漫記》是在紅軍到了延安之後寫的，而薄復禮是在這之前即長征期間寫的。我講這個的意思是，中國共產黨歷來就有這個傳統，希望要把這批人包括信教的群眾以及他們的代表人士團結過來，以保證長征的勝利，而且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始終把他們看成是執政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強調，宗教問題始終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宗教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域中具有特殊重要性，把宗教問題上升到「治國理政」的層面。

什麼叫「特殊重要性」呢？那就是，一，關係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二，關係到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三，關係到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四，關係國家安全和祖國統一。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用這四個關係來看待宗教問題的特殊重要性，於是，正如你剛才所說，許多問題就慢慢化解了。通過不同的實踐來總結一些經驗，當然也汲取一些教訓，這些教訓我認為主要是在處理一些宗教問題具體工作層面上的問題。因為不同地區對政策的理解深度不一樣，在處理一些宗教問題具體工作中也會有一些不同。我也特別希望不僅國內的，也包括國外的方面都能夠正確理解中央的政策，正如八二年中央十九號文件所說的，信教的群眾和不信教的群眾之間的差異是次要的，我們不要把這些次要的差異放在第一位去討論或爭論，我們更應該看到，信教的群眾和不信教的群眾都是我們基本的公民，他們在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文化利益上的追求都是一樣的，都希望我們這個國家發展起來富強起來，這就是我們大家能團結起來的重要基礎。從信徒本身來說，這次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也規定不能挑起矛盾，包括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包括教會之間，都不能挑起矛盾，不同宗教的內部矛盾也不能挑，因為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和團結。還有一個我想介紹的是，習總書記去年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特別講過，要構建積極健康的宗教關係。這就涉及到好多方面的關係，第一個是黨和政府跟宗教之間的關係；第二個是宗教跟社會之間的關係；第三個是國內不同宗教之間的關係；第四個是信教群眾同不信教群眾之間的關係；第五個是我國宗教跟國外宗教之間的關係。這裏最核心的是黨和政府跟宗教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我們現在正討論的政教關係。所謂中國特色，這個「特」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社會主義制度，無論信教還是不信教，都要認清這個性質。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只是依法管理宗教同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有關係的那一部分事務，而真正宗教內部的事務是不會去干涉的。習總書記還特別強調，要用法律規範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行為，用法律調節涉及宗教的各種社會關係，這裏突出了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必須依法進行，而不是隨意亂來。相對地，宗教方面，則不要去干涉行政、司法、教育等這些屬於國家的職能。這些關係處理好了，大家各安其事，相信社會變得更合諧。

政府不幹預信仰的教義與內部事務的方向

□：你講「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只是依法管理宗教同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有關係的那一部分事務，而真正宗教內部的事務是不會去干涉的」。這是令信徒安心，政府不幹預宗教內部事務，只是在

國家及公共利益上管理，顯然政府無意願去改變信仰內容，故有時傳聞政府和教堂產生衝突的問題，是管理上的問題為主。信徒的願望正是政府不幹預信仰的教義與內部事務，我自己的理解，宗教人士好像認為無神論的政府是會對付宗教這問題，是並沒有搞清楚，美國及西方國家的政府，也是宗教上中立的，其運作也是依無神論的。政客個人信宗教是一回事，但政府運作肯定是用無神的規則，美國總統是信基督教，但打伊拉克時他是無神論的，及國家利益這觀點來打的。因為很多時候，政府不可有宗教的立場，在西方也一樣的，關鍵是政府法律須容許宗教的自由，依法律來處理宗教事務，而不是依意識形態。從根本上來說，政府只是一個客觀運作，不以有神無神來劃分。我看中國對待宗教問題，起碼現在不是以無神論來指導運作的，早期可能有一些諸如「宗教消滅」等理論，現在這個理論也不講了，而且宗教學者都在努力證明宗教是會繼續存在的，包括證明馬克思等人對宗教是很尊重的。

中國政府是按實踐思維的

我瞭解現在中國政府關注的主要問題不是講無神論，發展和富強才是最主要的問題。我認為現在中國的路線基本是從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下來的，這個理論是繼承明末儒學內心修養的實踐，如劉宗周講的「慎獨」，是純實踐的。到清初王船山分析歷史，對現實歷史的大勢與勢中之理的反省，說「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這勢中之理，就在實踐中的理解。從革命時的毛澤東，到改革時的鄧小平，都是純由實踐處境中，摸著石頭過河。現在習近平時代的領導方向，則是接近中國傳統易經智慧的實踐論，易經作為一種決策學，在某個處境情況中看到平衡點在哪裏，實際運作中如何做才能得到最好成果，不是先來一個大意識形態去看問題，而是先從實踐中進行處理。中國政府的方向關鍵是實踐論正在起很大影響。

人性的共通點

說實在的，我們過去一直以為共產黨對宗教是有偏見的，但後來慢慢發現共產黨也是有人性的共同點，很多人都是有理想的，但很多人也有腐敗，人類都有這種良知和罪性，不同信念的人也有共同人性。但以我們努力在中國撫貧的經驗看，很多官員發現我們在從事真正的愛心和關懷工作時，他們不但很支持我們，也在默默地保護我們。雖然我們是從國外回來，他們也總是給我們充足的空間。我們發現一個人性的規律，如果你是中國人的好朋友，你愛中國，那麼，你信什麼或者有沒有宗教都是沒問題的。反之，如果你是敵人，那麼無論是信宗教還是不信宗教，都是敵人。中國對朋友是感恩的，如果你在困難的時候幫助過他們，他們會永遠記得。如果是敵人故意來破壞，他也會知道並且防範你。這就是我對中國的國情某一種理解，用真誠的愛來對待中國，中國一定不會忘記的。

傳連璋、葉永青與明妮．魏特琳

基督徒跟共產黨也實在有些仁愛相交的歷史，最近看南昌起義的博物館，看到福音醫院，原來在福建邊界長汀有個福音醫院就是傳教士辦的，就曾無私地醫治紅軍傷兵。

■：紅軍當時在福建的時候，在長汀的醫院就是叫福音醫院。院長傅連璋當時就曾經是一個基督徒，他在新中國成立後一直當到中央衛生部副部長。

□：是的，當時基督徒辦的醫院救了三百個紅軍傷兵，後來這基督徒的醫生傅連璋還把醫院送給了紅軍，之後遷往江西瑞金，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正規的醫院。結果他參加了革命，解放後成為中

中國對朋友是感恩的，如果你在困難的時候幫助過他們，他們會永遠記得。如果是敵人故意來破壞，他也會知道並且防範你。用真誠的愛來對待中國，中國一定不會忘記的。

將。

■：我們曾經兩次評選宗教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獲選的都是那些在中國革命時期幫助和支持過紅軍和解放軍的宗教活動場所，裏面就有不少教堂，或者紅軍在那裏開過會，或者拿出來作醫院救治傷員等等。至少不能說是中國共產黨與宗教之間是天然的歷史矛盾吧。一些傳教士也幫過共產黨。

□：對，我讀到一個令人感動的記載，挪威傳教士葉永青(Peter Torjesen)在山西河曲建了一個醫院，抗戰時救助很多傷兵和難民，賀龍的八路軍部隊在抗日時也經過，得到他們幫助，賀龍還專門寫信表示感謝。後來日本人知道，轟炸那個醫院，把傳教士也炸死了。他的四個兒女有三個都在中國出生，四九年以後他們本來要繼續留在中國像父親那樣為中國服務的，但後來還是離開了中國，回到挪威，之後又到了美國，從事醫生工作，一直期待回到出生地山西的故鄉，結果等到改革開放後，他們從中國留學生那兒打聽到有來自河曲的，聯繫後終於又回到中國故鄉探望。一九九〇年中國政府在河曲立碑「人民烈士」，紀念這位為中國犧牲的宣教士。還有四川華西醫科大學過去也有很多傳教士在那兒工作，現在也有博物館介紹這些情況。傳教士確實做了不少貢獻中國的事，不一定全是帝國主義的。

■：這些事實我們都很清楚也是認同的，我們中國現代西醫的建立，學校教育的發展，都有傳教士等社會公益組織的貢獻。

□：有的傳教士在日本的南京大屠殺時曾救過許多中國人，如明妮·魏特琳(Minnie Vantrin)就被譽為「活觀音」。這個實在也是一種中國化的表達。

■：是啊，這就是中國民間一種最樸素而最真實的表達。

□：中國開放後，我到中國做了十年農村工作，我第一次到雲南時，在昆明的酒店吃早餐時遇到一個洋人，聊天時他說回中國已經有二十年了，比我這個中國人還要早十年進到中國。他是一個教育學博士，幫中國做了很多事，也提出很多好的建議。談話深入後我才知道他也是一個基督徒。這個我很感動，外國基督徒比我早十年到中國服務。

■：有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聖經的印刷。我們支持中國基督教兩會在美國搞了兩次聖經展。以前有些偷運聖經的組織曾散布謠言，說「中國的信徒沒有聖經讀」、「中國如果有聖經也是被政府刪改過的」，等等，所以很多美國人在觀看展覽時很關注這些聖經有沒有被刪改，後來發現並沒有，都是很完整的。聽說許多偷運聖經的組織都關閉了，老百姓感也不給這些組織捐錢了。中國最早的愛德印刷廠，我曾去過，早期的印刷設備和聖經紙都是國外捐助進來的，經理則是一個新西蘭人，我們都見過。愛德印刷廠現在印聖經已經達到一億四五千萬了。一位非洲基督教領袖來愛德廠參觀，發現甚至連他們部落語言的聖經也有印刷。當年鄧小平先生訪問美國，當時的總統卡特向鄧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印刷聖經，一個是美國向中國重新派遣傳教士，鄧回答說，印刷聖經可以，但重新派遣傳教士不行。這說明我們政府對這些宗教工作並沒有限制的，比如類似這些外國的資助只要遵守中國的法律規定，在中國是允許的。海外的許多教會是尊重中國教會的獨立自主自辦權的，他們的捐助是不附加條件的，不能因為捐助而要中國教會完全聽他們的。中國對教會由中國信徒獨立自主自辦看得很重，這涉及到中國教會的主權問題。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不會改變，但還是有一些原則要堅持的，比如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原則，中國的宗教事務由中國人自己辦理，這些原則憲法有明確的規定，是來自於中國的歷史，特別是近代歷史。

□：這個我們都很清楚和理解，第一是因為中國長期遭受外國侵略，是受過傷害的民族，傷害之後對外面的懷疑是很正常的，而且現在確實有些國外勢力還是對

中國對教會由中國信徒獨立自主自辦看得很重，這涉及到中國教會的主權問題。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不會改變，但還是有一些原則要堅持的，這些原則憲法有明確的規定，是來自於中國的歷史，特別是近代歷史。

中國敵視，要把中國搞亂，中國要防範是很正常的。根據我的體會，海外信徒回國服侍人，關鍵是要有單純的動機，仁愛的品格，只要你真心愛中國，誠意地服侍中國人，做事完全透明，就不會受到難阻。

中國教會對外交流，須平等互動

■：這裏的前提是，中國教會的健康發展，包括適應時代的發展，需要對外交流，需要國外境外（包括港澳台）教會的幫助。但確實要看到，有一些是懷有目的的，過去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傳教士司德敷(Milton Theobald. Stauffer)編過一本書，叫《中華歸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說整個中華都歸向上帝，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國文化。二〇〇三年，美國前《時代》周刊駐北京記者部主任大衛·艾克曼(D.Aikman)寫過一本書叫《耶穌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提出要以耶穌這隻羊馴服中國這條龍，這已經不是文明之間的交流，而是高高在上擺出征服的姿態，而中國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最不屈饒的就是這個東西，不光是宗教，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國雖然暫時得了便宜，但中國人民的抗日的毅力還是很強的。

所以，只要在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我們才能進行合作和交流，包括神學教育，教會管理制度，教會開展社會公益慈善，都要向國外學習經驗，這是政府支持的。對於滲透，我們只反對兩點，一個是政治性的，目的是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二個是我們對宗教有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制度，違反了這些也不行。中國的宗教團體和教會組織的領導權，絕對不容許受外國勢力支配，這個其實憲法上都講得很清楚的。

□：還有一個海外很關心的問題，就是關於家庭教會，大約在二〇〇九年，我曾寫了一建議交給研究宗教的智庫學者，指出家庭教會不是政治上反中國，只是神學上與當時三自教會的最高領導不同，應有方法使其在神學爭議之外得合法存在。在新宗教條例下，有無存在空間？未來會有如何發展呢？

■：我們在用語上一般不使用「家庭教會」這個詞，我們一般是指未經登記的私設的聚會點。中國其實對信徒在家裏成員中查考聖經，還有家庭成員拜佛，一概都不予干涉的。但是，經常性的有組織的固定的講道，這就超出了家庭的範圍。坦率地講，這種私設的聚會點是有不同情況和不同原因的，例如，有的是因為老年人行動不便，去教堂路遠，就近在私設的聚會點活動，我們準備以後通過以堂帶點的方法解決，由正式登記的教會派教牧人員去帶領活動。有的則是因為神學上的原因，或其它原因（如派別、經濟、權力等複雜情況），他們也聲稱願意接受政府的管理，對這些我們現在不會一棒子打死，但會想辦法把它們納入正常管理之中，比如為他們指定臨時活動地點，在經過一定時間之後具備條件去完成登記手續。還有一種，就是有外國勢力支配的，從國外派人或操縱，這是不允許的，要堅決打擊和取締。這一點，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至於有的人是在境外如香港或者其他國家按立牧師的，或者在國外留學卻按立牧師回來活動的，或者在周邊國家私自參加培訓班的學員，我們肯定不能承認的，因為中國對教職人員認定備案有一整套法規制度。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對這些問題都有明確的規定，違反了就要受到處罰。我也借此機會奉勸海外一些組織和人員，不要給這些中國出去的人員按立牧師或拉攏組織培訓，這些人回到中國會面臨法律的制裁，這是在害他們而不是幫他們。用基督教的話，就是一切按照律法來，什麼事都不會有的。

無神論與創造論

□：最後一個問題，因為教育是政府管理的，但政府主流是無神論的，教進化論，而教會教相信是有神論，講創造論，其

中國教會的健康發展，需要對外交流，只要在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我們才能進行合作和交流，包括神學教育，教會管理制度，教會開展社會公益慈善，都要向國外學習經驗，這是政府支持的。

中也不否認科學的發現，孩子隨父母到了教會，也會聽到創造的傳述或故事，政府對教會內的這些講法容許嗎？

■：關於宗教和教育，國家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都有規定，國家實行宗教跟教育分離的原則，憲法也規定宗教不得干涉國家的教育活動，總的精神是不能在學校傳播宗教。因為我們的學校是由國家主體意識形態來決定教育性質的。至於因為孩子小，信徒父母去教堂做禮拜時把孩子帶過去，由專人照顧，講講中外歷史文化故事，因為那個環境那種情況，順其自然也就可以了，但對這些孩子的托管，主要是照顧他們的安全，不能強制灌輸宗教思想、不能強迫未成年人信教，否則與國家的相關法律相違背。現實中我們也發現，有的是把傳教目標釘在孩子身上，有針對性地向他們傳教，這是不允許的，所以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明確規定，決不允任何組織或個人在宗教院校之外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傳教、舉行宗教活動、成立宗教組織、設立宗教場所、發展信徒。

□：我們知道在基督徒和政府管理之間，兩者的不同理解會長期存在，這需要一個時間和實踐的過程去慢慢達成共識和默契。我期望中國基督教能按聖經原則講，又能配合文化與社會的特質，生根在中國，健康而合法地發展，不會成為一個敏感課題反而是一正能量。這次對話很好，因過去在海外對中國宗教政策有些是道聽途說而來，聽到負面評論與純推測的判斷，也有不少疑慮，今次能與官方學者直接正面對話，可以明白政府對宗教的政策與觀點，澄清不少疑惑，也明白一些限制，我們期待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能成功。信徒在這歷史過程中，須彰顯天國的福音，天國不是死後去的世界，卻是臨在地上，行出上帝的慈愛、仁義與救贖，天國就在人心中，原意是在相信的群體中間。基督使天國臨到人心，但仍待終極完成，神學上稱為already and not yet（有譯為「既濟未濟」），信徒群體在地上，就永遠奮鬥去行出愛與義的見證，對未來有永生的盼望。

我們期待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能成功。信徒在這歷史過程中，須彰顯天國的福音，天國不是死後去的世界，卻是臨在地上，行出上帝的慈愛、仁義與救贖，天國就在人心中，原意是在相信的群體中間。

Dialogue Basis of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bstract: The most recent conference of the Martin Luther celebration on the occasion the 50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ation, the Chief Editor of this Magazine, Dr. Thomas Leung has a deeply dialogue and exploration about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ith the Director of the State of Religious Affairs, Mr. Liu Jinguang. In this dialogue, regarding to an Official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Religious Affairs, Mr. Liu clarifies and explains the policies and rules, especially some related to religious and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China. As for a Christian Scholar, Dr. Thomas Leung believes that this dialogue is very profitable. Dr. Thomas Leung hopes that the Christianity in China can follow the biblical principles, coordinate the attributes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oo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develop healthy. It will not become a sensitive topic, but stay positive.

Keywords: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Management of Religious, Rel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